

◎ 张伟胜 著

SHIJIAN LIXINGLUN

实践理性论



浙江大學出版社

衢州学院学术基金资助出版

实践理性论

张伟胜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实践理性论 / 张伟胜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7
ISBN 7-308-04352-5

I. 实... II. 张... III. 实践论—研究 IV. B0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78386 号

责任编辑 曾建林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浙大路 38 号 邮政编码 310027)

(E-mail: zupress@mail.hz.zj.cn)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印 张 16.75

字 数 300 千

版 印 次 2005 年 7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8-04352-5/B·062

定 价 26.00 元

序

人类感性的实践活动是在人类理性指导下的有目的、有意识的价值活动,这种理性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实践的价值。在人类相互联系日益密切,人们的实践活动、结果及其影响不断趋于全球化,人类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生存共同体的今天,生存与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前所未有而又无法回避的矛盾与危机,逼迫我们不得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去思考和追求实践活动的合理性问题。实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加快中华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使得研究指导实践的理性本身的合理性问题也相应成为我国理论工作者一项越来越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对此,国内学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张伟胜同志所著的这本《实践理性论》,正是从哲学层面上对人类实践理性问题进行有益探索的理论成果之一。

总体上说,本书是关于实践理性问题的导论性质的著作。作者在哲学人类学的视野里,始终聚焦于人的生存和发展,从讨论人类实践的根本目的入手,通过对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诸方面关系的理论求索,展示了作者对实践理性问题的一种致思路向和个体领悟。这种思虑与领悟对于读者思考有关实践、实践活动与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应该会有所助益。

张伟胜同志作为高校的理论教育工作者,一直对哲学研究怀有浓厚的兴趣。2003年至2004年,他在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其研究主题便是关于实践理性问题。现在,他的研究成果即将付梓,我为他感到高兴并乐于应约为其作此短序,愿他的研究取得新的进展。

万 斌

2005年3月于杭州

引 言

——人类理性发展的基本进程

“哲学起源于人对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之惊异。”

人的自然属性使人类最初的认识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外部世界。人在生存实践活动中感受到的外在世界,有太多的事物让人迷惑不解,隐藏于其中的种种变幻莫测的神秘力量更是让人惊异不已。正是这种困惑和惊异使人意识到了自己的无知。为了摆脱无知,人们不得不努力去认识和理解自然,为了求知而追求学问。因此,早期的哲学家进行哲学思索是源于无知、困惑和惊异,无论是仰观天文还是俯察地理,致用尚未成为主要目的。人自身亦并未成为哲学直接关注的对象。这个阶段是人类理性刚刚处在认知理性的起步阶段,这时候的人更多地带有“自然人”的特征,其认识成果形成了最早的自然理性。

随着认识的不断发展,后来的人逐渐认识到在一切可感惊异的存在中,其实人自身才是最令人惊异的存在。当人把原来一直向外注视的目光收回自身,开始向内注视自己的时候,惊异地发现原来人有一个完全不同于外在世界的内在世界——“自我”,并具有那么多的能力。人有能够用来表情达意相互沟通的人造符号系统——语言,有看不见摸不着却复杂无比的思想,有奇妙大胆超乎现实的想像,能够自我设定各种目的并千方百计去实现预定目的,能够自我组织并设计创造出各种复杂的事物来为自己服务,人对现有的一切总是不满意,因而能够通过自身的努力去达到对现实的超越。人体验到了蕴藏于自身的内在力量,看到了人与别的生命的重大区别。这一切对人来说,就像日月星辰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诱惑,令人着迷。于是,研究这最令人惊异的东西——人自身,以寻求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便形成了哲学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转向。

对人的研究必然要牵涉到一些有关人的最基本的问题。如,人是从哪里来的?人与自然是有什么关系?人与神有什么关系?人与社会是什么关

系?人与自身是什么关系?人的本质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把人抛进了一个无法摆脱的认识漩涡,越卷越深。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人的物质需要和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与方法的局限性,这个过程显得比较缓慢而漫长。人对自身的认识和理解也处在人类幼稚的童年时代。无论人对自然和人自己了解了多少,对人来说,自然与人总是具有某种神性的存在。这种神性是人在自然和人自身面前保持谦卑的根源。在西方,这次哲学转向的结果和标志是在基督教普遍传播的背景下确立了上帝对人的统治地位,人成为神的奴仆,神学的启示代替了哲学的思索。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表现为宗教理性。

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推动着人的以生产劳动为基础的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与扩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与确立,科学与技术不断发展,工具理性日趋成熟。从近代开始,人类对自然(包括人自身)的探索不再仅仅停留在惊讶感的满足上,而是自觉地通过对自然的“祛魅”和对人的内在力量的激发,有目的、有计划地对自然进行“征服”的实践活动。资本的本性使人的需求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对消费性物品的直接有限需要变成了对以货币为形式的财富占有的无限需要。满足这种需要的手段与途径就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利用工具和技术对自然进行掠夺性开发。就在这个过程中,始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并于黑格尔达到高峰的近代理性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第二次重大转向:从由惊异而产生的对自然和人自身的神秘性的追问,转向了以确立人的主体性为目的的对人的自觉研究。这次哲学转向的基本标志是把人“从天国拉回人间”,去掉了人身上的神性,确立起人本应有的内在价值、权利与尊严,使从属于神的“神性人”变成了受“自我”支配的“理性人”,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占据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也许是人的认识发展规律的作用,这次哲学转向并没有使哲学变得完善起来,而只不过是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显然,在近代以至现代理性主义中,“理性人”并不是现实的感性的人,而是被抽象化、逻辑化了的“理性人”。这样的“人”是一种被异化了的人,产生这种异化的物质力量则是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资本。人类刚从上帝的阴影中走出来,便置身于康德、黑格尔的“逻辑王国”,而且还不幸地掉进了资本的陷阱。正是冷酷无情的逻辑和资本的结合把人异化成为没有人性的“理性人”。在逻辑与资本的共同作用下,以科学技术为形式的工具理性疯狂扩张,由此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自我的全面对立和战争。这就是西方思

想界在 20 世纪所激烈批判的“现代性”。人类还来不及庆祝自以为取得了“征服自然”的伟大胜利,便突然发现自己已经陷入了可怕的生存危机之中。

当人们冷静下来反思近代以来人类引以为自豪的理性主义时发现,人的生存危机恰恰源自于理性自身的危机。显然,实践活动所带来的生存危机表明,人类的实践理性已经发生了严重问题。工具理性僭越价值理性,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霸权主义取代自由平等的交往理性,物欲横流淹没了精神追求而使人格理性趋于没落,人们从事一切实践活动只关注自己的目的能否实现。至于更为重要的目的本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以及达到目的的手段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却成了人类追问的视野之外的东西。

第二次哲学转向以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和价值理性的日益萎缩与迷失而走向终结。人虽然从天国回到了人间,但是,人并没有因此获得完整的人性而成为真正的人。

由于人对自然的无度开发所引起的生态危机,由于对资源的相互争夺所引起的战争灾难,由于物欲的过度膨胀所引起的自我迷失,把人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这迫使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实践活动以及指导这种实践活动的实践理性。这种重新审视导致了哲学史上的第三次重大转向:从抽象的“理性人”的研究转向以感性实践为基础的“现实人”的研究;从人与自然、社会、人自身的分裂和对立转向了对自然、社会与自我的和谐统一关系的整体性研究;从追求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转向追求实践理性的全面发展。这次哲学转向的标志是以实践为基石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诞生和反思现代人类实践、追问人类实践合理性思潮的兴起。对以理性主义为思想旗帜,以资本主义制度为物质载体的“现代性”进行全面批判解构,并且在此基础上重建有利于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实践理性,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真正还人以人性的本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成为哲学史上第三次转向的主要内容和目标。

当代哲学已经抛弃了为知识而知识的偏见。尤其从马克思开始,实践唯物主义把哲学看作是感性实践的活动的产物,又是指导感性实践的原则,把哲学从一种单纯的解释世界的知识变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在马克思看来,实践是哲学的来源与归宿,实践是理性的实践,理性是实践的理性。理性与实践从相互分离走向相互统一,是使理性与实践产生飞跃的一个基本条件。

哲学将自己那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理性之光照耀人的感性实践,为人

类的感性实践指出终极的理想目标,提供正确、可靠的理性原则和方法,这应该是当代哲学的根本任务。而自然理性→宗教理性→工具理性→实践理性的演绎过程,则既反映了哲学思维的内在规律,也体现了哲学发展的必然归宿。

自18世纪康德提出实践理性问题以来,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现代哲学到后现代哲学,它一直是西方哲学的热门话题之一。在中国,虽然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实践和实践理性的哲学传统,但它主要侧重于伦理道德范畴,缺乏对人类感性实践活动的系统全面的把握和研究,因此,真正对实践以及实践理性问题进行系统而深入的哲学研究则是20世纪的事。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对现代资本主义的深入批判,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的反思,以及对当代实践所带来的巨大的反主体性效应的警醒,广义的实践哲学日渐成为国内哲学研究的主流。通过对康德哲学的批判来超越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通过对近现代理性主义的批判来重建当代人类理性,从而建构起一个能够指导21世纪人类实践的新的实践哲学体系,是许多哲学工作者努力的目标,并且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研究成果。本书试图以此为基础,从系统的角度对实践理性问题作一整体概述并初步建构起一个实践理性的基本理论框架。

本书内容大致上由实践理性的基本部分和实践理性的扩展部分构成。著者认为,实践理性应该是一个以人类感性实践为基础的广义的哲学概念,它包括与实践的目的相关的目的理性;与对实践活动的选择和评价相关的价值理性;与实践的内容、形式和方法手段相关的工具理性、交往理性、人格理性等。与当代实践最重要的现实问题紧密相关的生态伦理和普世伦理也是实践理性的重要内容,是对实践理性诸方面的综合、深化与扩展。

目 录

引 言——人类理性发展的基本进程	(1)
------------------------	-------

第一章 实践理性概述

第一节 实践、理性与理性结构	(1)
第二节 实践理性的本质与建构	(11)
第三节 实践理性的合理化	(20)

第二章 目的理性

第一节 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目的理性	(25)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的目的理性	(34)
第三节 人是人的最高目的	(40)

第三章 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

第一节 技术理性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形态	(47)
第二节 技术理性的形成及其作用	(53)
第三节 对技术理性的批判	(60)
第四节 对技术理性批判的批判	(72)

第四章 交往理性

第一节 “现代性”之争	(79)
第二节 交往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83)
第三节 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	(87)
第四节 对“交往乌托邦”的批判	(96)
第五节 当代交往实践需要什么样的交往理性	(101)

第五章 人格理性

第一节 被“抛”入世界的人——“网中生存者”	(107)
------------------------------	---------

第二节 人性、人的本质与人格	(113)
----------------------	-------

第三节 人生意义与理想人格	(142)
---------------------	-------

第六章 价值理性

第一节 何为价值理性	(154)
------------------	-------

第二节 主体性原则与现代社会的价值理性危机	(160)
-----------------------------	-------

第三节 重建当代价值理性	(174)
--------------------	-------

第七章 实践理性与生态伦理

第一节 生态伦理思潮的兴起	(182)
---------------------	-------

第二节 生态伦理学中的“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	(185)
--	-------

第三节 作为实践理性的生态伦理原则	(201)
-------------------------	-------

第四节 生态伦理实践的困境及其出路	(210)
-------------------------	-------

第八章 实践理性与普世伦理

第一节 普世伦理及其产生背景	(220)
----------------------	-------

第二节 怀疑的声音	(228)
-----------------	-------

第三节 从实践理性的角度看普世伦理	(232)
-------------------------	-------

主要参考书目	(253)
--------------	-------

后 记	(257)
-----------	-------

第一章

实践理性概述

为了交代清楚本书所讨论的实践理性的基本含义,了解实践理性的基本内容,从整体上把握实践理性的理论架构,明确研究实践理性的目的和意义,首先对实践理性作一概要叙述是必要的。

第一节 实践、理性与理性结构

一、实践

在中国古代,“实践”一词首见于宋代吴泳的《鹤林集·上邹都大夫》中的“实践真知,见于有政”一句。后世王夫之在其《张子正蒙·太和篇》中称,“知之尽,则实践之而已。实践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故乐莫大焉”。

在西方,最初使用实践一词的哲学家可算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说:“只要一息尚存,我永远不停止哲学的实践。”^①后来的亚里士多德进而认为,“人间的至善在于实行(行为)”,“实践就是幸福,义人和执礼的人所以能够实现其美德,重要的在于他们的行为”,所以人应该“以有为(实践)为最优良的生活”,“只有善德是不够的,他还得具备一切实践善行的条件和才能”。^②

古代哲学家认为,实践就是实行、履行、有为。实践的一般词义就是实际地、亲自地做或作为。同时,实践又是某种东西的实践,借用现代现象学中的词语,可把实践说成是具有某种“意向性”结构的活动方式,它总要指向某种对象,把它们作为自己行动的内容。

然而古人研究哲学虽然觉察到了实践的意义,但并没有把实践本身当作哲学问题进行深入自觉的思考和研究。第一个将“实践”范畴引入哲学并进行

① 《西方哲学原著》,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68 页。

②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 1965 年版,第 350、249、351 页。

认真研究的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康德指出,实践是“指人的意志对于对象起作用的行动”^①。他运用“人”、“意志”、“对象”、“起作用”和“行动”这些词语来表述实践概念,表明实践外延的特定性和内涵的丰富性。他还强调实践绝非人类世界的个别现象,而是一个可以表征人类存在本质的概念。不过康德所理解的实践仅仅局限于伦理道德范畴。黑格尔在实践问题上比康德进了一步,他是从劳动的意义上理解实践的。“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②但是,由于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唯心主义性质,他所讲的劳动只是“抽象的精神的劳动”,他所讲的实践实质上也只是理念活动的一个环节,而不是真正的感性意义上的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则更进了一步,他把实践理解为以劳动为核心的人的感性活动,认为“全部人的活动迄今都是劳动”^③，“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④。因此,我们说只有到了马克思这里,实践的内涵和意义才第一次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获得了真正符合其“本性”的理解和揭示。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人的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或者说是感性的人的活动,是人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它具有客观物质性。实践的主体是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他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一定的方式从事各种各样的实践活动,构成相应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具有人类实践活动所特有的社会历史性。无论是实践的主体、对象、工具还是结果,都具有普遍的直接现实性,它与纯粹经院哲学式的“抽象的思维”或“理论的活动”具有本质的区别。

实践是人们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进行的探索和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活动。这种活动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关系的最基本最现实的方式,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中实现的人和物、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能动的活动过程。在实践活动中,人既按照外部对象的尺度进行活动,又把自己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按照这双重尺度改变外部对象的现成形式和规定,创造现实中既不现成存在、也不会自然产生的具有符合人的需要的形式和规定的理想客体。但是,人类在实际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之前,总是首先要观念地处理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头脑中观念地实现外部对象的尺度和主体

① 齐良骥:《康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③ 同上,第127页。

④ 同上,第120页。

内在的尺度的统一,亦即人在通过自己的活动去把事物改造成适合自身需要的客体之前,必须事先解决什么样的东西才适合人的需要以及怎样才能把现成事物改造成适合人的需要等问题,观念地预演这一活动过程。

实践的这一特性说明,人的实践固然是感性的活动,但它并不是无理性的本能的盲目活动,而是有意识、有目的、在理性指导下的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

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人“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人在实践中不仅把自然界作为对象,而且把自己的活动、把自身、把自己和他人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变成对象。他还指出,实践是“革命的”、“批判的”活动,并经常把实践称为“变革的实践”、“革命的实践”。实践的革命性、批判性表现为通过实践可以“改变世界”或“改造世界”,既改造自然,也改造社会,还改造人自身。“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②

实践是主体性活动,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类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社会历史就是一部人的实践活动发展史。实践活动过程是一个主体性、创造性、价值性、工具性、文化性、社会性、意志性、现实性相统一以及主观与客观、主体与客体、精神与物质、理论与现实、自由与必然相统一的“精神客观化”的运动过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马克思就指出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都不理解真正的实践。因为在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那里,实践是片面的,要么是纯精神的运动,要么是纯感性的活动,这两者被人为地割裂了。马克思则认为理论必须与实践统一才有意义。他说:“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③

实践活动是人类运用自己不断创造出来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以追求理想的应然生存状态的活动。制造工具是人类超越动物的分水岭,人类的实践活动总是伴随着工具、手段与方法的创造和运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量发明和普遍运用,既确证了人类自身的伟大力量,又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但是,由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工具本身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③ 同上,第15页。

无价值选择的属性,它的力量即使再大,也始终只是被动的东西。真正决定人类命运的并不是工具,而是创造和使用工具的实践主体——人本身。人拥有什么样的目的理性和价值理性,工具便会相应地在实践过程当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此,这就从根本上要求人类的实践活动不但要追求工具的合理性,而且还要追求实践目的的合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最优化。

最为重要的一点,实践是人类自我生成、自我创造和自我发展的唯一条件和途径,没有实践就不会有人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如恩格斯所说,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且,实践也是沟通人与外在世界的中介,是人生存于世界所凭借的手段。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将客观世界“内化”为主观认识并生成各种思想、理论、精神,然后再将主观认识“外化”或“对象化”为客观事物,进而实现和发展思想、理论、精神的过程。就在这样不断反复的实践过程当中,人的外在世界日益变成为人化的世界,人自身也日益走向自我完善。

总之,实践是在人的理性指导下的感性活动,一切实践都是人的实践,一切实践都是为了人,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通过改造外在世界以达到改造内在世界之目的“成人”的过程。这是实践最基本的要义。

二、理性

人是具有理性的存在者。人类的实践活动离不开理性。

在西方,从古希腊时代起,理性一直是其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

“理性”原本是指人心区别于“感性”(或“感受性”)的“自发性”或“能动性”,具有“超越性”与“规范性”双重品格。如果作词源的考据的话,理性的这双重品格正源自古希腊超越的“努斯”(nous)精神与规范的“逻各斯”(logos)精神。“努斯”是指生命冲动的力量,“逻各斯”则是指逻辑规范的力量。努斯和逻各斯是西方理性概念的渊源所在。

在希腊文中,“逻各斯”具有多种不同的含义。据《希英大辞典》对这个词的解释有十种含义:(1)计算、尺度;(2)对应关系、比例;(3)说明、解释、论证、公式;(4)灵魂内在的考虑,如思想、理性;(5)陈述、演说;(6)口头的表述、言词;(7)特殊的说法,如神谕、格言、命令;(8)所想的、说的东西,如对象、主题;(9)表述的方式,如理智的、文学艺术的表述;(10)神的智慧或言词。格思里在《希腊哲学史》第一卷中,也曾对公元前5世纪及其以前的哲学、文学、历史著作中有关逻各斯的用法归纳出十种含义:(1)任何讲的以及写的东西,包括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2)所提到的和价值有关的东西,如评价、名誉、名声。(3)进行思考,早在巴门尼德,逻各斯就是和感觉对立的思想或推理。(4)从所讲或所写的发展为原因、理性或论证。(5)和“空话”、“借口”相反,“真正

的逻各斯”就是指事物的真理。(6)尺度,完全的或正当的尺寸。(7)对应关系、比例,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逻各斯经常指严格的数学上的比例,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公元前5世纪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在这种含义下使用逻各斯这个词的。(8)一般的原则或规律。格里里认为,这种含义的逻各斯要到公元前4世纪前后才出现,如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说的“正确的逻各斯”;他认为,说公元前5世纪已有这种含义的例子,可能只是误译;他以为要说到最接近于公元前5世纪的,也只能推到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他们在有些地方说到的逻各斯,接近于一般规律的意义。(9)理性的力量。这种意义的逻各斯显然和上述第三、四种含义有联系;但格里里认为说逻各斯是理性的力量,是到公元前4世纪的作家中才成为通常的用法的,他们说人和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逻各斯。(10)定义或公式,这是表明事物的本质的,亚里士多德经常使用逻各斯的这种含义。这种含义到公元前4世纪是相当普遍的。^①

在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逻各斯这个词被多处用到,但主要地用来表述“尺度”和“比例”,是后来哲学上讲的一般规律的最初表现。同时,赫拉克利特还将逻各斯与灵魂、思想联系起来,认为“人人都能认识自己并有健全思想”。这里所说的“认识自己”,也就是在公元前6世纪时铭刻在德尔斐地方的阿波罗神庙进口处的那句格言:“认识你自己”。而这里所说的“健全思想”也可以说就是灵魂的逻各斯。所谓健全的思想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即自然)去认识它们,只有这样,才能说出真理和按真理行事。但他又认为自然的本性喜欢隐藏起来,所以我们看不见真相。要把握真相就要用智慧通过思想去发现本来就存在的东西的真理。在赫拉克利特时代,物质和精神在哲学上还没有明确区分开来,因此,他在使用逻各斯这个词时,有时将它说成是主观的思想,有时又说成是客观的尺度。但在他的残篇当中,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他是承认人人具有共同的理性,且这种理性是能够认识普遍的真理的。虽然赫拉克利特还说不上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他是哲学史上最早提出认识论的问题并且注意到感性和理性是两种不同的认识的哲学家,他的“逻各斯”确实体现着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精神。

到了巴门尼德,他也使用“逻各斯”这个哲学范畴,但他是在把它作为一种理性的推理方法或者说论证方法的意义上来使用的。如他在残篇第八中说“现在结束我关于真理的可靠的逻各斯和思想”,这里的“关于真理的可靠的逻各斯和思想”,可以理解为他在此前关于存在的理论和论证。他在残篇第七中说女神告诫巴门尼德“要用你的逻各斯去解决我告诉你的这些纷争”。这里的

^①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第456—457页。

逻各斯就是指的理性,但这个理性除了“理智”的意思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含义,就是他所使用的辩驳式的论证即逻辑推理。巴门尼德把这种理性的推理方法叫作逻各斯。

理性又与“努斯”这个概念密切相关,“努斯”本来是希腊语中的常用字,相当于中文的“心”、“心灵”,泛指感觉、思想、意志等精神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主体。在荷马的史诗和许多作家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这个词。在早期哲学家的残篇中也出现过这个词,但没有给它以特殊的意义。将“努斯”作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从阿那克萨戈拉开始的。在西方哲学史上,他是第一个明确地将“努斯”视为理性的精神实体,也是万物的本原。这为阿那克萨戈拉本人赢得了“努斯”或“心灵”这个绰号。^①在阿那克萨戈拉看来,“努斯”是无限的,又是单纯、一样、自我同质的;它是同万物完全分开,不相混合的独立存在的单一体;它是能动的,不但推动宇宙的漩涡运动,而且支配和安排万物,形成有秩序的(善的和美的)宇宙;它具有认知全部事物的本性并且决定宇宙事物的能力。由此看来,“努斯”是一种和物质完全分离的精神的理智力量,是高级的精神活动即理智和理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阿那克萨戈拉的“努斯”是宇宙万物构造有致、井然有序、安排合理的原因,孕育了通向目的论的因素。黑格尔在论述阿那克萨戈拉的哲学时曾强调指出:“在努斯中有着目的、善”;他认为以前的哲学原理都涉及物质、质料和运动,“现在阿那克萨戈拉这里,出现了第四种原理,即理由、目的范畴以及努斯”。^②

将只有人的理性才能认识到的客观世界的秩序和规律,看成是人的理智、努斯自身有目的的活动的产物,是理性本身的对象化。这是带有目的论意义的努斯范畴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努斯范畴可以看到,在人类早期的理性认识当中已经内在包含了宇宙秩序和目的的思想。古希腊哲学家在本体论层面上对“宇宙理性”的揭示,建构起西方人最基本的理性主义文化信念:世界是合乎理性的存在结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物可以通过理性把握世界的结构,从而控制和操纵自然。

明确提出“理性”范畴的哲学家是阿那克萨戈拉,他认为:“物的‘种子’是存在物的始基”,“由于感官的无力”,它只能认识具体的事物而不能感知“种子”或“始基”,“我们才看不到真理”。要认识真理、认识“种子”就要依靠理性,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始基”。理性使我们凭借“可见的东西”“看到了看不见的

^①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354—356页。

东西”即种子或始基。^① 柏拉图视理性为宇宙的本质,用理性解释世界存在的根据。

到了近代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理性概念得到了深化。康德把理性同知性概念区别开来,认为知性是有条件的、有限的,理性概念是关于无条件的和绝对的东西的概念,是超越经验的纯粹理性形式。因此,理性不过是主观自生的“先验的概念”,是用来系统化知识的一些指导原则。康德将人的认识能力划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环节,而理性是从感觉开始、经过知性之后所达到的认识的最高阶段,它要求认识现象世界背后的“本体界”即自在之物本身,获得关于整个世界的绝对的无限的认识(即理念),并建立知识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系。可是理性自身没有先天形式的缺憾,导致只能借用认识有限的相对的经验对象的知性范畴去把握无限的绝对的超验对象(即自在之物),这样一来,理性由于不可解决的自相矛盾而陷入了“二律背反”的泥潭。对此,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曾作过中肯的评价:“就康德理性矛盾说在破除知性形而上学的僵硬独断,指引到思维的辩证运动的方向而论,必须看成是哲学知识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推进。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就是康德在这里仅停滞在物自体不可知性的消极结果里,而没有更进一步达到对于理性矛盾有真正积极的意义的知识。”^② 于是,黑格尔从他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辩证思想出发,把理性看作是“理性的观念”、“真理的观念”,认为理性具有最完全的认识能力,是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是概念与实在、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他还将理性划分为消极(或否定)的理性和积极(或肯定)的理性,认为积极的理性使矛盾双方互相依赖并达到对立面的统一,揭示了事物的本质,这是真正辩证的理性。黑格尔通过他的唯心辩证法把近代理性精神推到了发展的顶峰。

近代西方的唯理论哲学将理性看作是知识的源泉,认为只有理性才是最可靠的。而18世纪的法国哲学则将理性从认识论领域引申到社会领域,认为凡是合乎自然、合乎人的本性的就是理性,把理性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和标准,因而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的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就是理性精神,理性主义是资产阶级在启蒙运动中自始至终高举的一面思想旗帜,是人类走向现代性的灵魂。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理性通常指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的理性(认识)阶段,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人们对事物的本质、全体和内在

① 参见汪子嵩等:《希腊哲学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80—882页。

②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3页。